

人类安全的现状：概念、理论与实践

前言

在以国家行为体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人们对安全威胁这一概念的认知主要涉及免受外来侵略的领土安全、对外政策中的国家利益保护或者免遭核浩劫的全球安全等。然而，近年来的安全威胁逐渐复杂化、多元化。面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疾病、饥饿、失业、犯罪、社会冲突、政治迫害、恐怖主义和环境灾难等威胁，传统安全的概念无法全面地概括当今社会人类发展面临的全部挑战。面对传统安全研究的局限性，批判理论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安全研究之外提出了新的研究路径，融入了后殖民主义、性别、马克思主义等视角。其中，人类安全作为批判安全研究的一个分支，不再限制于对国家行为体间武装冲突的讨论，而是从人类尊严的角度出发，寻求使人类“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全球治理新思路，安全研究的目的也从减少冲突逐渐扩大为到如何对赋能人民并保护基本自由以保障全体人类可以有尊严地生活。

1994年联合国在其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人类安全”这一概念，使得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挑战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也开始关注以人为核心的安全理念并付诸行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安全威胁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跨国影响，人与人的命运联系更加紧密，人类安全的概念也被更多国家和地区组织所接受。2003年，美洲组织在其《美洲安全宣言》中也强调了“人的安全”的重要性；同年，欧洲理事会也批准了欧洲安全战略(ESS)，该战略多次使用了人类安全概念(Kotsopoulos 2006)；2005年，非盟把人类安全概念写入其《非洲联盟互不侵犯和共同防御条约》中(Tieku 2007)。中国、俄罗斯等国虽鲜少使用“人类安全”这一明确概念，也发展出了符合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学说去支撑以人为本的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

因此，鉴于人类安全这一概念对安全研究的创新性、学科跨度与前瞻性，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出版了人类安全研究报告，旨在帮助读者了解人类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概念和相关讨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探索各国如何推广人类安全这一新理念。本报告也将重点关注我国如何将符合国情的安全理念融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人类安全研究注入活力。

第一章 人类安全的定义

在现有文献中，人类安全的定义十分模糊。Tadjbakhsh曾指出，“人类安全”一词的使用方法迥异：它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或概念、分析的起点、世界观、政治议程亦或者政策框架（Tadjbakhsh 2005）。

“人类安全”这一概念的提出源自于人们对“发展”和“安全”概念的日益不满(Acharya, Rajaretnam, and Singhdeo 2011)。传统的安全观念以国家为单位，主要强调不受他国武力侵犯的领土安全。但冷战后，安全威胁逐渐多样化、复杂化，许多国家行为体无力为自己人民提供的基础服务，甚至在一些极端案例中，政府还作为施暴者威胁到了部分人民的生存。在传统安全与发展限制下，国际人道主义干预也并未开展有效的建设和平行动。同时，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消失和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可能性的降低将安全事务的重心从国家间冲突转移到了跨越国界且涉及诸多非政府行为体的安全威胁。内战、种族屠杀、恐怖主义、贫困、疾病等安全问题威胁着整个世界，他们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样需要得到关注。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呼吁开拓安全事务新思维。

1994 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阐述了对联合国对“人类安全”这一概念给出的定义：“人的安全有两个主要方面：它首先意味着免受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威胁的安全状态。其次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在家中、工作中还是社群当中免遭突然和有害的破坏。（p23）”。报告随后提出了人类安全这一概念，并列举了构成人类安全的七个方面：经济安全（基本收入有保障），粮食安全（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公共卫生安全（相对免于疾病和传染），环境安全（能够获得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和未退化的耕地），人身安全（免遭人身暴力和威胁），共同体安全（文化特性的安全），政治安全（基本人权和自由得到保护）。虽然人类安全的相关定义并无统一，但是 1994 年版人类发展报告传达了一个新的共识：国家不是安全研究的主体，人类的福祉应该成为目的。它既体现了深度全球化时代人类对各类安全的新诉求，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并可为全球治理的升级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人类安全的定义主要分为两派。罗兰-帕里斯（Roland Paris）指出，人类安全这一概念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定义。支持广义人类安全定义的学者则认为，人类安全应该包含发展和人权等诸多方面。人类安全的广义定义为政治议程增加了多元性，并将人的主观感受引入了政治讨论。这一点对与为个体和群体创造体面的生活环境至关重要，因为增加对边缘化安全概念的关注本身是对主流政治议程的挑战，推动决策者从公民自身的感受出发，制定合理的政策去发现并解决安全威胁。豪尔赫·内夫（Jorge Nef）设计了一个五重分类方案，认为人类安全包括（1）环境、个人和身体安全；（2）经济安全；（3）社会安全，包括“不受基于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地位的歧视”；（4）政治安全；（5）文化安全，或者“社会的一系列心理取向，旨在保持和增强控制不确定性和恐惧的能力”。卡罗琳·托马斯（Caroline Thomas）认为，人类安全指的是提供“基本物质需求”和实现“人类尊严”，包括“从压迫性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无论其起源和范围是全球性的、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罗伯特·贝德斯基（Robert Bedeski）指出，人类安全包括“保护、捍卫和保存人类生命的生物存在的知识、技术、机构和活动的总和，以及保护和保护生命的过程，从而完善集体和平与繁荣，增进人类自由”。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安全威胁仅仅应该涉及对暴力冲突有延续作用的因素。其中对于广义人类安全定义的批评主要来自于现实主义视角，认为威胁种类的无限制增加会给学术研究徒增困难，并减少对人类生命安全产生直接威胁的紧急元素的关注。同样，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说，多样的安全威胁种类和定义的可延伸性使得对一些重点方面的针对性解决方案更加难以开展。加里·金（Gary King）和克里斯托弗·默里（Christopher Murray）在他们正在进行的人类安全项目中采用更狭义，更精确的术语来定义人的安全这个概念。他们的定义仅包括“基本”元素，即“重要到足以让人类为之战斗或将其生命或财产置于巨大风险中”的元素。利用这一标准，他们确定了幸福、贫困、健康、教育、政治自由和民主的五个关键指标，并打算将其纳入个人和群体人类安全的总体衡量标准。同加里·金和克里斯托弗·莫里所提出的标准类似，坎蒂·巴杰派（Kanti Bajpai）建议构建“人类安全审计”以更精确地对人的安全进行定性，其包括“对个人身体安全和自由的直接和间接威胁”的措施，以及不同社会“应对这些威胁的能力，即促进规范、制度和……决策结构中的代表性”的措施。

第二章 人类安全概念的学界讨论

在人类安全的定义之外，学界中也同样存在大量对这一概念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讨论，正如罗兰-帕里斯（Roland Paris）指出，在人类安全的主要研究模式中，广义和狭义两种思维引导出了人类安全概念研究两种倾向。而于此同时，人类安全研究也逐渐发展出了几种范式，包括：安全问题研究范式、发展问题研究范式和社会分析研究范式。因此，人类安全广义派和

狭义派在不同范式的研究中进一步迸发出了更多与这一概念相关的辩论，使人类安全研究在近几十年中涌现大量成功。以下将介绍当今学界中依靠不同研究范式及定义思维所得的成果。

2.1. 安全问题研究范式

人类安全的安全问题研究范式是一种更贴近传统安全问题研究的模式。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亚普·迪·怀尔德（Jaap de Wilde）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 of Security Studies）所认为的，安全的核心意义是有关生存，生存的问题即会关联两个对象：“参照对象”和影响参照对象的“事实威胁”，参照对象为了保证其自身的生存需求便需要以采取“紧急措施”来达到目标。正因为人类安全将传统安全问题中所讨论的“参照对象”和“事实威胁”进行了修改和一定意义上的扩充，这类研究范式的理论研究构建便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现象。

2.1.1. 人类——国家关系理论

在巴里·布赞的人类安全研究中，他从设定的几个领域展开了讨论，分别是：军事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以及环境领域。不同的领域中都存在特定的“参照对象”及参照对象关联的“事实威胁”和“紧急措施”，“事实威胁”因不同范畴和不同对象而变化，但不变的是出于对生存的需求。在布赞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讨论中，他认为个人是安全概念所能适用的最小基本单元，也就最基本的参照对象，但个人与普通物体不一样，前者的安全需要以多重因素进行衡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领域的许多情景。同时，布赞的结构现实主义框架也强调了人类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区别，即参照对象指示的不同单元之间存在区别，因而不能将以不同参照对象为中心的不同安全问题一概而论，这些问题间往往是存在相互作用的。布赞认为，正是因为“个人”、“集体”、“国家”这三个参照对象的差异，导致国家和个人的“国内模式”中存在相互威胁和相互保障的情况。具体来说，国家在一些安全问题上为个人提供保障，但由于上文所述的安全问题领域之广，这种某一方面的保障可能影响到个人的其他安全领域而产生事实威胁。此外，这种行为对国家内不同的集体也会产生更复杂的效果，而这就是布赞在他的理论中所提到的国内模式非二元性。在这些事实威胁的存在之下，三个参照对象都会采取各自的紧急措施以应对安全威胁，致使人类安全的国内模式极具复杂性且实质上无可避免。

在这一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通过案例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国内模式的实际形式。朗达·卡拉威（Rhonda L. Callaway）和朱莉·哈里森-斯蒂芬（Julie Harrelson-Stephen）通过对北爱尔兰问题的研究讨论了当英国与爱尔兰民族派群体因分治问题和历史遗留的宗教问题产生愈发激烈的武力冲突时，北爱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对英国的威胁是如何上涨的。这两位学者认为，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的增长与三个人权领域相关：政治参与、人身安全和生存需求。具体来说，一国政治越封闭越会导致个人和集体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来争取政治权。而在个人安全上，毫无人身安全的隐患的国家会相对低程度的面对恐怖主义威胁，但如果在这领域的压迫达到一定程度后，恐怖主义威胁同样会下降，北爱问题正是发生在这两种值域之间。生存需求领域则与个人安全类似，恐怖主义威胁的增长同样是需要建立在个人的生存需求被适当满足这一基础上。

不过，中国学者石斌则从中国的经验来讨论了人类安全——国家安全的矛盾的可调合性。他认为，人类安全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和终极价值，这一概念同时具有道德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但是，尽管人类在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对个性的追求，其本质上仍保有社会性，即对有序社会的天然倾向。因此，人类安全的本质可以说是在有序社会中追求个人安全与福祉并对此不断进行改良，而满足这些发展在当代社会制度下也是国家稳定及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所以，人类安全在一定层面来说和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矛盾的。

2.1.3. 社会安全困境理论

在上文所述的巴里·布赞的国内模式非二元性概念下，布赞对“集体”的讨论在他的作品中形成了一套安全困境理论。安全困境本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用来描述国家间由于不安全感而致使对军备竞赛报以执着态度但又因此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不安全感的两难处境，但布赞将这一理论代入了自冷战后期起愈显频繁的国家内冲突中，认为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安全困境是“社会间的不安全感”。保罗·罗伊（Paul Roe）通过对克罗地亚族和塞尔维亚族在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期间的冲突，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族人和罗马尼亚政府的矛盾进行案例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在当代民族主义的刺激下所形成的以单一民族成员组成的集体如何与其他类似的集体产生冲突。换言之，基于不同民族身份认同所形成的包含许多个人的社会之间存在不同的安全需求，例如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反抗罗马尼亚政府的民族融合政策的匈牙利人和前者代表的主体民族，而这种与文化、政治，甚至军事相关的安全需求正是当代所面临的一种社会和人类安全问题。

2.1.4. 保护力量理论

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从东欧国家在东欧剧变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展开了她对人类安全实践的讨论。她认为，东欧剧变所带来的政治改革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使东欧国家在社会层面上有西方世界所期待的人权状态改善，反而正在面临着更多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跨境犯罪、政治压迫等问题。同时，卡尔多还表示当代的人类安全研究更多地关注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忽略了政治和犯罪威胁对社会的影响。因此，卡尔多所设想的人类安全实践侧重于将其中的事实威胁传统化，从传统安全的范式思考人类安全问题中所能采取的紧急措施，也就是军事相关的措施。为此，卡尔多首先以她认同的全球化概念作为大前提讨论了以保障人类安全为核心的国际化的国家体制改革；此外，卡尔多还认为国家的，甚至国际的当代军事改革不应该延续冷战的国家间阵营化冲突思想，转而形成保护力量，以确保人类安全在国家框架内的维护。

2.1.5. 人道主义干涉理论

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和威廉·托（William T. Tow）从国家和政策决策者的角度分析了人类安全概念的实践性。在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变得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他们认为人类安全的定义和实践应该从更加国际化的角度来讨论，即参考各种相关的跨国安全问题，以此来做到在解读不同国家和决策者对国际人道主义冲突及跨境干预问题所采取的行为上更具效用，为这些相关行动进一步补全理论基础。但是，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J. Bellamy）和马特·麦克唐纳德（Matt McDonald）则反对了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解读，他们认为人类安全问题相对更频繁地出现在单一国家内，因此不能过度关注在跨境安全问题上，且需要更多的从人类单元的视角出发，即从人类在单一国家内的生存需求和活动能力来探讨人类安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具体的政策实践案例上来说，欧洲安全能力研究小组在巴塞罗那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人类安全概念便是代表着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一个质变。萨沙·沃特斯（Sascha Werthes）和大卫·博索尔德（David Bosold）从欧盟的角度出发展开了对人类安全的政策实践讨论，认为人类安全不只是欧盟安全政策的主题，也不像规范权力或平民权力等概念那样，而是对欧盟国际角色进行分类的分析标签。相反，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和弗朗索瓦·杜兴（Francois Duchene）认为人类安全为安全行动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动态的组织框架，这是目前从欧洲外交政策文本和实践中借鉴来的。因此，他们强调人类安全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主动的战略叙事，它有可能进一步促进欧盟外交政策的整合。

2.2. 发展问题研究范式

发展问题研究范式与安全问题研究范式所侧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同，这一板块的理论更加偏向于采用新自由主义思维，将许多安全问题研究范式中的国家这一行为体的影响进行了相对的削减，更大程度上地从“人类”出发，并主要以人类安全定义的广义派视角展开了讨论。其中，人类需求理论是这些理论中最为核心且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2.2.1. 人类需求理论

加里·金（Gary King）和克里斯托弗·默里（Christopher Murray）认为人类安全研究的参照对象应该被视为个人，而这种个人更多的是对人类个体的描述，而不是侧重于不同民族、群体身份之间的差异。在这一基础上，脱离普遍贫困标准便是人类安全的核心，即满足人类的基本物质需求。基于这一观念，坎蒂·巴杰派进一步提出应参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审计工作来为人类安全领域进行年度审计，做到从人类发展问题的层面上量化人类安全问题，以确保人类安全的保障。

2.2.2. 全球化理论

全球化理论延续了人类需求理论的主要思维，将满足人类的基本物质需求视为人类安全的核心，但全球化理论详细讨论了人类安全问题如何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财富分配问题。在这一环境中，本就存在的物质需求问题愈发加剧且变得更具广度。因此，为了治理全球化影响下的人类安全问题，世界范围内的政府管理机制都需要进行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协调。

2.3. 社会分析研究范式

与安全问题研究范式和发展问题研究范式不同，社会分析研究范式在人类安全研究领域相对来说并不占据主流地位，这一模式通常偏向于以跨学科思维对人类安全展开讨论，习惯通过诸如心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 and 逻辑来对人类安全问题研究进行补充。

2.3.1. 心理建设理论

詹妮弗·里宁（Jennifer Leaning）和山姆·阿里（Sam Arie）通过对来自非洲国家的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出了一套以心理层面为一大重点的人类安全理论。他们认为，为确保最低限度的人类安全以实现促进人类发展的前提，基础的物质需求和心理建设需要满足，其中尤其是心理建设需要实现群体心理层面上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体现在对群体身份的认同以及“家”这一概念的肯定。

2.3.1. 规范复合化理论

在社会科学中，“规范”通常指的是“人们共同认可并遵守某种行为准则的现象”，在不同的且存在矛盾的规范之间，他们的关系往往以替代作用呈现。在栗栖薰子的专著中，她认为人类安全领域的研究需要关注“规范复合化”的现象。栗栖薰子指出，当下的人类安全概念包含了许多安全研究领域，这些领域中都存在着成型的规范，而这些规范之间又存在着矛盾，因此如果简单

地将人类安全拆分成不同领域进行单独分析，则一定程度上会忽略不同领域中既存规范间的矛盾。对此，栗栖薰子认为对于人类安全的研究和分析应该更注意不同领域间的有机调节，而不能单单关注某一方面的应对和解决方式而过度套用某一种规范。

第三章 人类安全国际实践

一、联合国：以人类安全为应对方法

2003年，绪方贞子和阿马蒂亚·森领导的独立的“人的安全委员会”在其题为《人的安全现状：保护和赋权于人民》的报告中把“人的安全”定义为“以增进人类自由和成就的方式保护全体人类生活的重要核心。该报告基于为期两年的研究、实地探访和公众听证会，提出了一个应对严重威胁人的安全的问题的行动框架。

2012年，联合国大会 66/290 号决议规定落实了人类安全应对方法。该报告强调，人的安全以国家掌管权为基础，在必要时以国际社会支持为辅助：

“由于在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以及在不同时间，人的安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迥异，维护人的安全，能帮助各国以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式解决问题；各国政府在保障本国公民生存、生计和尊严方面继续发挥首要作用并承担首要责任。国际社会的作用是应各国政府请求，予以配合，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加强它们应对各种现有威胁和新出现的威胁的能力。要维护人的安全，需要各国政府、国际和区域组织及民间社会加强协作和伙伴关系。”

报告同时将人类安全的概念与保护责任和履行保护责任做出了区分，指出维护人的安全不必涉及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采取胁迫措施。在联合国给出的框架中，国家作为提升国民安全的主体对本国“人类安全”的维护起主要作用，并未对以人类安全名义进行涉及武力的跨国行动做出授权。

联合国在开展工作中以人类安全为应对方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性案例如下：

1) 1999年以来，联合国人的安全信托基金在为采用人的安全方法的实地项目输送财政资源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13年，该信托基金资助了对人的安全项目进行独立、快速评估的工作。对世界各地的项目审查后发现，一个突出情况是，与得到单一途径支持、目标单一的应对措施相比，人的安全应对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强调广大社区面临的各種挑战相互关联。特别是，该报告强调，必须跳出短期解决办法的藩篱，推动全面、预防性而不是被动应对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受影响社区、政府和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有充分证据表明，此举可带来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解决方法，能够加强当地的所有权、加强可持续性，促进将取得的成果推广至其他团体和其他地理区域。

2) 在巴勒斯坦国，在《2009/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采用了人的安全方面分析。通过针对巴勒斯坦国面临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经济、安全和政治挑战情况而重新审查国际援助，报告主张采用可以加强弱势群体复原能力的更全面、民众可更多参与的方法。此举导致实施了若干多机构项目，旨在全部落实各群体的福祉。根据这些经验，人的安全应对方法成了2013年巴勒斯坦国首个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最有效框架。

3) 在太平洋次区域，在2013——2017年次区域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中采用了人的安全应对方法，以反映该次区域14个太平洋岛屿国家和领土的当地具体情况，这14个岛屿国家和领土是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纽埃、帕劳、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托克劳、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通过与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协商，制订了一

个适应当地情况的、全面而又灵活的框架，从而确保将弱势群体和偏远社区纳入国家发展优先事项。

二、国际社会回应与实践

尽管联合国对于宣传并实践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念付出了诸多努力，各国对人类安全的实践也有所不同。从传统安全到人类安全的实践转变意味着重塑国家安全观念，深刻认识不同安全风险之间的联系，同时建立新的监测和安全风险预警系统。这种转型意味着在国家层面需要重新审视主权和安全的联系，并推进新的治理方式以及其衡量标准，而当今政治制度的多元性和价值分歧不足以使人类安全作为普世价值被各国接纳。本节将对部分代表性国家的人类安全实践进行梳理，阐述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与替代性实践方法。其中，包括欧盟、加拿大、日本和英国在内的积极倡议者在官方文件或发言中明确了“人类安全”一词，并明确提出了确保人类安全的战略方向；美国则不常在官方层面使用人类安全这一概念，但在实践层面与欧洲各国及加拿大相似，将非传统安全的许多方面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中俄两国则对人类安全概念提出了基于自身文化和政治背景的独特见解。

美国

2022年10月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指出：“我们还将建立新的方式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在发展和扩展人类尊严方面合作，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们是所有美国人安全和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染病、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非正常移民等威胁往往因更深层次的发展挑战而出现或加速出现，而且一旦出现，它们就没有国界。跨国威胁反过来又会破坏发展，加剧贫困和人类苦难，并助长恶性循环（*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22，p.19）。“虽然人类安全一次未在报告中出现，但是报告中所使用的安全话语明确展示出美国也采取了以确保人的尊严为核心的安全观念，充分认识到跨国威胁的严峻性。这种认知为美国牵头或参与的一系列“人道主义”行动进行铺垫，从道德角度为其在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粮食、军备、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全球战略和干预行动提供了理论支撑。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灵活应对基于武力的传统安全威胁。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美国也对国内的人类安全状况有所关注。2020年美国CATO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美国，越来越少的人因为他们的种族归属而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食品广泛供应，政治压迫很低，美国人越来越富有，环境退化的速度正在放缓，环境指标在改善，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报告得出结论，美国的居民是安全的，而且一直在变得更加安全（Rugolo，2020）。然而，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表的《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则提出不同观点，从种族歧视、疫情防控、枪支管控、贫富差距和警察暴力等角度，指出了美国国内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现状（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2022）。

美国高校和学界在人类安全有关事务上开展了积极的行动。哈佛大学的全球公平促进会吸引了各界名人，其中包括人类安全领域著名学者阿马蒂亚·森。该项目在全球公共卫生和健康方面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产出。同在哈佛大学，人道主义政策和冲突研究项目为从事冲突预防和治理的国际组织提供技术援助与信息支持，先后发表过政策简报、系列论文、书籍章节和杂志文章。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也开设了人类安全研究所和复杂紧急事件响应与过渡促进会。福特人类安全研究所也在从事政治暴力的原因、冲突对平民的影响、冲突解决途径及从冲突到稳定和和平的转化的相关研究。福特研究所认为，人类安全与国家安全相互增益，当政府不能够或者不愿意保护人民远离国内和国外威胁时，人类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就会出现；当人民的生命和生计遭受威胁时，政府会面临最大的挑战。

民间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安全项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尔湾市。它把环境变化放在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来考察，这些大环境是导致环境变化的原因，也影响着社团应对变化的能力。该项目的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各种社会进程（如全球化、贫穷、疾病、冲突）与全球环境变化共

同作用于人类安全的方式。自 1999 年设立以来，该项目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和学者建立了联系。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该项目发表了许多原创论文，同时也组织过相关会议。

日本

在 2005 年 World Summit 的成果文件中，日本政治领导人承诺 "在大会上讨论和界定人类安全的概念"。国家和国际组织应该在对成果文件中所载的广泛概念的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开展具体的合作，而不是专注于阐述这一概念的法律定义。这种共同理解符合人类安全委员会

(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提供的工作定义；"以加强人类自由和人类成就的方式保护所有人类生命的重要核心"。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定义不会阻止具体的合作。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努力和资源集中在具体的活动上，以扩大对处于各种威胁和不安全状况下的弱势人群和社区的生命、生计和尊严的支持。日本政府认为人类安全有三个关键点：第一，在处理全球问题时，它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方法，将个人和团体的生计和尊严置于关注的中心。第二，它要求的不是零散的方法，而是采取综合的、整体的和多部门的方法，包括人身安全、发展和人权。这样才有可能应对各种威胁，如冲突和暴力、贫困、不发达、传染病、侵犯人权和自然灾害。第三，应该遵循的战略是保护个人及其团体并赋予其权力。保护性战略使人们免受伤害。赋权战略帮助人们提高他们的复原力，使他们能够在衰退和困难的条件下生存。换句话说，"人的安全"把重点放在通过增强个人和团体的能力来预防。日本采取了各种举措来促进人类安全的广泛概念。为了支持联合国各组织在当地实施与“人类安全”有关的项目，日本向 United Nations Trust Fund for Human Security 捐款 3.14 亿美元，该基金由 Human Security Unit of OCHA 管理，资助了大约 70 个国家的 175 个项目。日本政府认为免于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同等重要。倘若“人类安全”的目标是确保作为人类之个体的生存与尊严的话，就不能只从保护冲突中个人生命的角度去思考人类安全问题。因此，日本政府所推行的人类安全概念比较接近 199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所提倡的人类安全概念。尽管日本政府积极推行人类安全概念，但也强调政府的重要性在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纪当中并未消失，“人类安全”的努力不会取代国家安全的安排，也就是说保护领土、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政府的责任。此外，尽管国家安全是确保“人类安全”(包括个人的生存和尊严)的先决条件，但国家安全不是唯一的要求。换言之，即使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强大，也并不保证生活在此国家内的人民也变得更安全或更富有。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个基础或环境，使个人能够照顾自己，并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发展其能力。日本官方表示并不同意对“人类安全”的关注可超越国家之主权，以及对“人类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可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以武力进行干涉的论点。在日本，人类安全的概念错综复杂，它的实施经验也异常丰富，其中包括政府议程、学术议程和 NGO 议程。在日本外交当局为可预见的未来制定的项目中，人类安全是支柱，例如日本的外交部负责向其他政府解释并推广该概念，以促使各国在弱势群体赋权问题上达成共识。在联合国系统中，日本政府同样高度强调这一问题，这不仅仅表现在对联合国人类安全信托基金的资助上。在援助和开发领域，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是主要参与方，它的负责人绪方贞子女士是过去十年中人类安全议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因此，通过日本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资助资金充沛的机构，人类安全的概念和实践开始落地生根。还有其他一些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也有同样的职能。当然，不断积累的研究成果无论如何也不会忽视组织暴力所产生的威胁。例如，关于非洲研究，日本拥有丰硕的成果，从事脆弱性问题研究的许多专家都涉及人类安全视角。目前，包括东京大学（可以授予人类安全硕士学位）、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在内的很多重点大学都在进行具体的人类安全学术研究。另外，日本学者对人类安全与企业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平与和解研究也很感兴趣。位于东京的联合国大学有和平与治理项目；东京外国语大学拥有一个积极进行和平与冲突研究的教师团队；早稻田大学则对人类安全与企业公民感兴趣。日本国际交流中心与庆应大学人类安全研究所在地域上有所侧重，主要关注亚洲的人类安全问题。除了东京联合国大学的研究和东京外交大学的和平研究以外，上述的研究活动几乎完全使用日语。

加拿大

在政策层面，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与外交部一直在推动人类安全作为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主题。这种做法标志着视角的转变，即把人，而不是国家或领土，作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参考点，对现有的安全保护和国际发展手段进行补充。同时，加拿大认为人类安全是超越国界的。在国家主权与个人享有自身安全的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和平衡，以及国际社会及其主要机构在解决对人民安全的新威胁方面的责任、义务和能力等议题上，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安全威胁的跨境影响并加以行动。加方对于保障国际人类安全的立场从“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出发，认为主权并非绝对概念，在主权国家无法对国民人权和安全提供基本保障时（如种族清洗），国际社会有权进行介入和干预。然而，“保护责任”概念在国际社会 2011 年对利比亚的介入后被多方质疑，认为所谓的“保护责任”在行动中会被滥用成为颠覆他国政权的借口。因此，加拿大所提倡的立足于保护责任的人类安全观念尚未形成很强的说服力。实践方面，伙伴关系和多边合作是加拿大人类安全工作的核心。近年来，加拿大常年致力于通过外交手段和建设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确保他国人类安全得到保障，在几个重要的人类安全倡议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包括在 1997 年达成了具有约束力的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国际公约，以及自 1998 年通过《罗马条约》以来为建立国际刑事法院以追究那些对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负有责任的人所做的努力。在建设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促进和保护人权，处理国际犯罪、腐败和毒品贩运，制止小武器的扩散，以及促进发展有效和人道主义的制裁制度、战争中的儿童保护和武装冲突中的平民保护等方面都有所努力（Moher, 2012）。加拿大仍然致力于在知识和实践上进一步发展该议程，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加拿大也希望看到国际刑事法院成为国际司法的有效工具，在确保自身遵守国际规范的同时吸引更多国家支持其建设针对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审理的常设法庭（Riddell-Dixon, 2005）。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加拿大在国际维和方面获得了国际认可。渥太华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国际声誉受到加拿大公众的广泛赞赏。该国的外交政策角色也已演变为加拿大民族认同中不可或缺的统一元素。然而，在后冷战时代，该国参与解决国内种族冲突的努力凸显了传统维和方法的局限性。加拿大部队被部署长期交战地点，甚至目睹了一些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最具破坏性的罪行（例如卢旺达）。1990 年代后期的财政政策也导致了加拿大的对外援助、国防预算和国际维和预算大幅削减，使得渥太华无力继续兑现曾经的国际承诺（Huliaras 和 Tzifakis, 2007）。加拿大外交政策和预期产生了差距。因此，加拿大希望将人类安全与冲突相关威胁联系起来，为该国的当代国际政策提供新的内容和动力，从而提升加拿大作为“良好国际公民”的国际形象和自我认知。

欧盟

2003 年 12 月，欧洲理事会批准了欧洲安全战略(ESS)，该战略使多次提到可以定义为人类安全议程的组成部分。例如，它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并承认“在许多发展中世界，贫困和疾病造成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并引起紧迫的安全问题”。尽管欧洲安全战略没有具体明确地概述欧盟人类安全议程，但应共同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的要求，一个欧盟研究小组于 2003 年秋季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制定欧盟人类安全政策的可能性并探讨了如何实施欧洲安全战略。

欧盟对人类安全的维护主要出于三个原因（*EU Human Security Approach*）：道德原因：认识到“我们共同的人性”以及所有人都有“有尊严和安全地生活的权利，以及在安全受到威胁时相互帮助的义务”，欧洲有义务为这个人类共同体做出贡献。法律原因：《联合国宪章》第 55 条和第 56 条呼吁促进普遍尊重人权，欧盟宪法条约明确承认欧盟有义务遵守这些原则。“个人利益”：如果世界其他地方不安全，欧洲就不可能安全，因为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在不断互相影响。这个看待安全威胁的新视角（例如，贫困可能滋生恐怖主义的发展）已经被置于政治议程的首位。

安全问题研究小组于 2007 年发表了《马德里报告》，进一步发展了欧盟的人类安全理念，并设计了在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的框架下将其制度化的方法。《马德里报告》强调，人的安全是关于个人和社区在危险时期的基本需求。它涉及到在街上的安全感，也涉及到物质生存和自由意志的行使。它认识到，“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对人们的幸福感和和平生活的意愿都至关重要。人类安全作为一项原则确定了欧洲开展独立行动的责任，并在必要时在欧

盟边界之外以保障人类安全之名义采取行动。欧盟曾明确表示，欧盟对人类安全的态度意味着它应该为保护每一个人做出贡献，而不仅仅是专注于保卫自己的边界。欧洲民意调查机构 Eurobarometer 的最新数据表明，公众普遍对欧盟更多地参与泛欧外交和安全政策持支持态度（Kotsopoulos, 2006）。

人的安全方法为欧盟提高其对外行动的一致性提供了蓝图，它也与欧盟的创始原则保持了着较高的一致性，并将原则转化为政策实践。但与此同时，政治考虑仍然在影响着欧盟的人类安全行动方案。在成员国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两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分的群体（Harnisch and Kim, 2020）。一是支持规范性的国家群体，他们评估人类安全面临风险，但不直接受到威胁。这个群体包括芬兰、瑞典等国家。虽然没有作为一个正式的团体，但这些国家注重对人的安全的解释，突出了对冲突解决、和平建设以及性别平等的关注。另一组是规范怀疑者和规范质疑者，如法国、波兰和匈牙利，他们批评这一概念过于模糊，操作后果不明确。第二组国家普遍承认具体的安全挑战，如性别平等，这是人类安全议程的一部分，但他们将这些问题作为单独的问题，而不是人类安全问题。由此可见，欧盟成员国倾向于围绕低度或中度威胁的看法，这取决于具体问题，但在是否将其作为人类安全问题来处理方面存在分歧。

英国

在英国国防部 2021 年发布的《防御中的人类安全》报告确立了三个目标。首先，确保英国国防人员有能力、理解和培训，以将人类安全考虑因素纳入其军事活动方法和规划。其次，将人类安全方法嵌入到行动方式中，通过与盟国、合作伙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商业部门的协调发挥更大作用。最后，要了解新出现的危机和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将如何引发人类安全相关问题，从而更好地识别预防机会，并制定保护、减轻伤害和持久的解决方案。英方认为，随着世界的变化，冲突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侵犯人权、以平民为目标和破坏文化财产的行为在武装冲突中越来越多地成为武器，并被用来制造不稳定。对民众的普遍威胁继续损害着可持续发展、和平和稳定的前景。随着这些威胁的重叠和倍增，不安全的累积效应可能对个人、团体、国家和地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人类安全是一种处理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方法，它将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传统上对国家安全的关注。英国自民党曾在 2021 年呼吁，在新冠疫情对英国国民生活的冲击下，内阁中需有人对人民福祉直接负责（*Global Human Security*, 2021）。然而，与加拿大等国一样，英国认为人类安全并不能取代国家安全；相反，它是对国家安全的补充和发扬。它适用于武装冲突门槛以上和以下的情况，跨越所有领域并超越地理边界。人类安全的普遍性意味着在英国在各个领域、区域都要将人类安全纳入战略和战术考量。

在全球疫情和经济形势的影响下，英国仍缺少针对人类安全的全球战略、资源和有效机制支撑其在人类安全领域的国际领导地位。在 2021 年 4 月 13 日英国国家议会关于人类安全的辩论中，气候变暖、贫困、核军备、网络安全和新冠疫情等威胁到英联邦内外人类安全的诸多挑战被反复提及。多位议员指出，英国应该在性别平等、人权、教育、粮食安全、环境等领域做出更积极的贡献，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投入英国政府增加国际援助预算。然而英国在 2021 年宣布将削减国际援助预算至国民总收入的 0.5%，这也是自 2013 年以来，英国将首次无法实现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联合国目标（Brien 和 Loft, 2021）。

俄罗斯

俄罗斯对人类安全这一概念的和多数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这种区别主要是来源于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接纳程度。对于俄罗斯来说，人类安全这一概念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紧密相连。俄罗斯领导人认为，人权或人类安全并非是国际问题。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定位于“进一步拆毁国际法”，其证据是“对南斯拉夫的野蛮轰炸，对科索沃的分离，以及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侵略。”对人权和民主促进可能会继续成为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价值冲突，俄罗斯如何将其视为是对联合国系统以及对自身的威胁。因此，俄罗斯的人类安全发展显示出未完全巩固的民主制度所特有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的特

殊规模，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复、深刻和潜在的不稳定的经济危机和冲突，都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拯救一个非常接近崩溃的国家。学者 Alfio Cerami 指出，这种大政府领导下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主自由为代价的：“经济复苏和进步得到了石油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帮助，这在人类安全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公民的人类安全的改善是不对称的，人类安全的某些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安全）比其他方面（如个人自由、政治安全以及移民和安全）更能从最近的结构转型中受益”（Cerami，2010）。

当今国际社会在人类安全方面的主要争议在于，俄罗斯等国对跨越国界的人类安全干预行动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以安全为旗号的势力扩张。而加拿大、欧盟和美国则认为人权保障应优先于主权，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全体人类能够有尊严地生活。除了理念上的争议之外，财政状况也成为了阻碍人类安全倡议者开展更多行动的绊脚石，特别是在面对新冠疫情和能源危机时，多数国家已经自顾不暇，或无法保障跨越国境的发展援助。面对国际社会诸多理论争议和现实挑战，中国在人类安全方向上的探索也渐渐明晰，形成了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共同利益的安全观念和和实践准则。

三、中国人类安全理念与实践

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冷战的结束致使传统安全威胁相较过去有了极大的缓解，中国便在这一大背景下开始了“安全新概念”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进一步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交流，因而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所产生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也开始在被中国政界和学界考虑。在 2000 年，中国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中包含了“非传统安全”的讨论，也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首次在正式讲话中提及“非传统安全”概念。随着 2001 年的“9·11”事件等一系列外部危机导致政界和学界开始从多方面反思中国安全的本质，非传统安全概念在中国发展出了“中国化”的“新安全观”，来反映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背景和偏好。此后，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包括《关于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中方立场文件》和《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等一系列文件声明了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对国际合作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尤其是主张推动建设相关的地区性机制。在国防领域，《2002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也强调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在亚太地区作为不稳定因素的存在，进一步表明了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程度。这种重视程度也反映在了学界，自 1994 年 1 月至 2009 年 2 月，中国知网中出现的含非传统安全关键词的文献达到了 1954 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分析往往与对非传统安全的更广泛的理解结合在一起，中国版本的人类安全概念也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即国家是一个关键的参照对象但国家与作为集体的人类之间互动关系相对并没有被强调——国家被视为是人类安全的保障，而不是对它的威胁。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尤其是学界，对人类安全概念存在认知及研究，中国官方并没有接纳人类安全，而是以非传统安全的讨论来概括了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的政府和学术界来说，人类安全和国家安全并不一定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与一些将人类安全问题的参照对象和事实威胁聚焦于国家内的理论不一样，“中国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应对模式侧重于国际化，即通过形成国际合作来应对人类这个广泛概念的一致的威胁。因此，中国学者高度评价“人类安全”，并认为它超越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研究的极限，是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最不传统的理论。

2003 年和 2004 年连续两次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都将“人类安全”列为主要议题。在后一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就人类安全问题做了专题发言，讲话涉及恐怖主义、传染病的蔓延等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会议最后提出了加强人类安全的共同主张。

2014 年 4 月 15 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在会上首次深刻阐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明确提出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15 年 7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地位。

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归结为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五大要素，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确保国家安全具备牢固扎实的群众基础。五对关系，就是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强调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面，只以其中一项为目标，两个目标均不可能实现；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强调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相互依存，有机统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强调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相互转化；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强调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条件下必须在世界安全格局中统筹本国与别国安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博鳌亚洲论坛 2022 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六个坚持”，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追求的是共同安全，有利于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国际秩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全球安全倡议面向全球开放，欢迎各国共同参与。中国不仅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者，也将是落实倡议的行动派。中国愿通过联合国平台以及多双边渠道，同各方就该倡议深入交流，相互启发，凝聚全球合力，推进倡议落地。长期以来，中国始终是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团结合作的中流砥柱。从坚持推动以政治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到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从全力驰援多国抗疫到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从秉持正确义利观、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2022 年 5 月 19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强调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国为全世界携手应对现实安全挑战贡献的重要方案。从主体、观念、规则、领域、举措等角度观察，人类安全共同体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念体系。从主体角度看，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的主体既是全人类又是各个具体的国家。从观念角度看，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既重视各个国家合理安全关切又强调人类命运不可分割。从规则角度看，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呼吁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奉行破坏共同安全的规则。从领域角度看，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强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都是共同安全范畴，应当统筹兼顾。从举措角度看，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倡导以对话协调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双重标准、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结语

人类安全这一概念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传统安全观念从国家行为体之间武力冲突的避免拓展到对个体生活尊严的保障，为安全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人类安全的重要性已经被熟知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是当今学界和政界对人类安全的概念性解读尚未达成一致，各国仍在按照自身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开展相关工作。在理论方面，各类研究范式都为人类安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了分析思路和框架；在实践方面，面对新冠疫情、全球变暖、能源危机等全球性挑战，各国所经受冲击的领域和程度都有所不同，各国政府保障人类安全的优先领域也不尽相同，导致了这一普适性概念的本土化和社会化。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没有一个国家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可以独善其身。因此，无论是从“保护的责任”

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人类安全的保障需要国际社会在多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寻找共同利益，探索合作空间，站在人类发展的长远角度探索新的合作形式。

参考文献

- Acharya, Amitav, M Rajaretnam, and Subrat Kumar Singhdeo. 2011. Human Security: 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 Case Studies From Northeast India And Orissa: From Concept to Practice - Case Studies from Northeast India and Orissa. Singapore,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http://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sciences-po/detail.action?docID=737596>.
- Bellamy, Alex J., and Matt McDonald. "The Utility of Human Security': Which Humans? What Security? A Reply to Thomas & Tow." Security Dialogue, vol. 33, no. 3, 2002, pp. 373–77.
- Breslin, Shaun. Debating Human Security in China: Towards Discursive Power?[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15, 45(2) : 243-265.
- Buzan, Barry, et al. Identity, 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 Pinter, 1993.
- Buzan, Barry,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7.
- Buzan, Barry. People, States & Fears: An Agenda for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ECPR Press, 2007
- Brien, P., & Loft, P. (2021). *Reducing the UK's aid spending in 2021*.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cbp-9224/>
- Callaway, Roland L., and Julie Harrelson-Stephens. "Towards a Theory of Terrorism: Human Security as a Determinant of Terror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29, no.7, 2006, pp.773–796.
- Cerami, Alfio. 2010. "Human Security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Journal of Human Security 6 (July): 7–27. <https://doi.org/10.3316/JHS0602007>.
- Dan Coats, Former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bably have to manage the impact of global human security challenges, such as threats to public health, historic levels of human displacement, assaults on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 Duchene, Francois. "Europe's role in world peace." Europe Tomorrow: 16 Europeans Look Ahead. Ed. R. Mayne. Fontana, 1972.
- Fioramonti, Lorenzo. 2012. "Human Security? The Weaknesses of the EU's Involvement in Human Rights Crise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doi.org/10.2139/ssrn.2119835>.
- Harnisch, Sebastian, and Nam-Kook Kim. 2020. "Human Security: A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in the EU and East Asia." Korean Society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11 (2): 143–78. <https://doi.org/10.32625/KJEI.2020.21.143>.
- Huliaras, Asteris, and Nikolaos Tzifakis. "Contextual Approach to Human Security: Canada and Japan in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2, no. 3, Summer 2007, pp. 559-576.
- Kaldor, Mary. "Human Security." Society and Economy, vol. 33, no. 3, 2011, pp.441–448.
- Kanti Bajpai, "Human Security: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Kroc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no.19, August 2000.
- King, Gary, and Christopher Murray. "Rethinking Human Securit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4, 2001, pp.585-610.
- Kotsopoulos, John. 2006. "A Human Security Agenda for the EU?" European Security, 20.
- Kurusu, Kaoru 栗栖薫子. "Ninzen anzen hosho 'kihan' no heisei to gurobaru gavanansu - kihan fukugo ka no shiten kara" 人間安全保障「規範」の形成と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規範複合化の視点から [Development of Human Security 'Norm' and Global Governance: How is a Norm-Complex Constructed in World Politics]. Kokusai Seiji 国際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43(2005): 76–91.
- Leaning, Jennifer, and Sam Arie. "Human Security: 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in Conflict and Transition." CERTI Crisis and Transition Tool Kit. 2000.

Manners, Ian.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2, 2002, pp. 235-258.

Paris, R. (2001).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Shift or Hot Ai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2), 87–102.

Riddell-Dixon, Elizabeth. "Canada's Human Security Agenda: Walking the Talk?"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0, no. 4, Autumn 2005, pp.1067-1092.

Roe, Paul. *Ethnic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Dilemma*. London: Routledge, 2005.

Shi, Bin 石斌. "Ren de anquan yu guojia anquan" 人类安全 and 国家安全 [Human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hijie Jingji Yu Zhengzhi* 世界经济与政治 [Global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2, 2014, pp.85-110.

Tadashi Yamamoto, "Human Security – What It Means and What It Entai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4th Asia Pacific Roundtable, June 3- 7, 2000, Kuala Lumpur, p. 9.

Tadjbakhsh, Shahrbanou. 2005. "Human Security: 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77.

Thomas, Caroline. "Glob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Exploring the Link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2, 2001, pp. 159–75.

Thomas, Nicholas, and William T. Tow. "The Utility of Human Security: Sovereignty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33, no. 2, June 2002, pp. 177-192.

Tieku, Thomas. 2007. "African Union Promotion of Human Security in Africa."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16 (June): 26–37. <https://doi.org/10.1080/10246029.2007.9627414>.

Werthes, Sascha, and David Bosold. "Caught Between Pretension and Sub-Stantiveness: Ambiguities of Human Security as A Political Leitmotif." *Human Security on Foreign Policy: Agendas, Changes, Concepts and Cases*. Ed. Tobias Debiel and Sascha Werthes. Duisburg:Eigenverlag, 2006.

Xiao Ren. Human Security: China's Discourses and Experience[J]. *Journal of Human Security*, 2016, 12(1) : 112-120.

'A Human Security Doctrine for Europe: the Barcelona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n Europe's Security Capabilities', presented to EU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Javier Solana, Barcelona, 15 September 2004, <http://www.lse.ac.uk/Depts/global/2securitypub.htm>.

"EU Human Security Approach | Human Security Course." n.d.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22. <http://humansecuritycourse.info/module-1-the-concept-of-human-security/eu-approach/>.

"Global Human Security - Hansard - UK Parliament." n.d.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22.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commons/2021-04-13/debates/10C5F578-2289-4E2E-85DD-0BD5D75EA7A2/GlobalHumanSecurity>

"Human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0. Cato Institute. July 1, 2020.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human-security-united-states>.

"MOFA: Statement by Ambassador Yukio Takasu,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Jap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matic Debate on Human Security." n.d.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22. <https://www.mofa.go.jp/announce/speech/un2008/un0805-6.html>.

Moher, Jennifer. "Canada's Human Security Agenda." 2012. Humanitarian Practice Network.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22. <https://odihpn.org/publication/canada-s-human-security-agenda/>.

"二十大·二十题之'共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人类安全共同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理念体系." n.d.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2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857127632995874&wfr=spider&for=pc>.

韩德,童俊,王志成,蒋湘平.人类安全议程新探[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2(01):68-86.

"新华国际时评: 破解人类安全困境的中国指引-新华网." n.d. Accessed September 29, 2022. http://www.news.cn/world/2022-04/22/c_1128586265.htm.

张晖、江爱民:《胡锦涛就人类安全问题发表讲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网站 (<http://gb.cri.cn/3821/2004/11/21/1062@366414.htm>)

张伟玉等:《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兼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2期,第94-120页。

赵远良,主父笑飞:《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